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宁宇 主编

赵记老局与 关中木版图画

老局

陕西民间美术
田野调查新收获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局造

赵记老局与关中木版图画

陕西民间美术田野调查新收获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编

王宁宇 主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记老局与关中木版图画 : 陕西民间美术田野调查
新收获 / 王宁宇主编 ;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编.
— 西安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368-3589-4

I. ①赵… II. ①王… ②陕… III. ①木刻—民间工
艺—研究—陕西 IV. ①J3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8721号

责任编辑: 张 弘 李 蕾

装帧设计: 张 婷 张 莹

封面设计: 哲 峰

赵记老局与关中木版图画 陕西民间美术田野调查新收获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 编
王宁宇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 李晓明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道登高路1388号
邮 编 710061
网 址 <http://www.msccbs.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20mm × 1000mm 16开本
印 张 22
字 数 318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8-3589-4
定 价 88.00元
发行电话 029-81205258 029-81205300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目录

前序 田野中的文化史追溯 王宁宇 /1

一、缘由与故事 /1

二、曲折的追寻线路 /2

三、从田野切入文化实境 /3

四、用实证说话 /6

五、从蒲城兴镇到关中的民间文化生态 /7

六、在田野追溯中感触文化史写作 /9

一个百年世家的木版图画生涯

——兴镇赵记老局传承人口述史采辑 赵明楠 解境怡 /13

一、赵氏一家人 /13

二、赵家原是从渭南搬过来的 /16

三、赵庆娃的青壮年时代 /18

四、兴镇木版图画当年的状况 /20

五、兴镇传统木版画受的折腾 /24

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经历的变化 /26

七、传统技术的传习精研 /30

八、21世纪以来的新境遇 /34

赵氏世家存世雕版考察报告 修建桥 张欣 王宁宇 /37

- 一、考察缘由与经过 / 37
- 二、蒲城县城里存留的赵家雕版 / 38
- 三、铜川市王益区文化馆藏赵家雕版 / 64
- 四、赵家新翻寻出来的老旧雕版 / 98
- 五、赵家近期生产使用中的雕版 / 118
- 六、结语 / 133

赵氏老局旧藏画样考察鉴识笔记 撒小虎 /135

- 一、门画类 / 137
- 二、神祇类 / 147
- 三、纸马 / 173
- 四、花炮皮 / 178
- 五、灯笼画和窗画 / 180
- 六、丧葬类 / 197
- 七、附论 / 200

陕西省艺术馆藏兴镇木版图画旧样清理记 张玲玲 /203

- 一、馆藏及清理工作概述 / 203

二、画样清理辑录 / 206

三、雕版清理辑录 / 262

四、小结 / 263

五、附言 / 267

蒲城兴镇赵家演示的几样传统技艺 韩湘 / 269

一、团圆夜里碰灯笼——灯笼纸 / 269

二、幽冥两界隔，寒衣寄哀思——寒衣纸 / 275

三、火树银花幻化前——炮皮纸 / 279

20世纪30至40年代关中木版图画遗珍的探讨 郇高娣 / 285

一、原中法汉学研究所收藏的三对门画 / 285

二、“第九号”门神画《马上鞭铜》的出品画局 / 288

三、“提长舞短”式《马上鞭铜》在关中的变体 / 292

四、从陈镇到兴镇，关中典型画样《状元插花》 / 295

五、关中气质的《刘海戏蟾》 / 299

六、卫聚贤采集的几例蒲城木版图画 / 302

七、结语 / 306

由蒲城兴镇考察引出的关中木版图画业生态史回眸 王宁宇 /309

一、赵记老局的“应激反应” /309

二、从印样遗存见赵家在兴镇木版图画业的地位 /311

三、渭北木版图画生态及“兴镇—西安模式” /315

四、地方经济、文化环境促成的产品内容 /322

五、刊号背后的产业体制与机制 /327

六、西安木版图画与关中产业链 /329

七、乡土文化产业的困境自救与活态保护 /333

前序 田野中的文化史追溯

◆ 王宁宇

一、缘由与故事

陕西在历史上是中国传统木版图画技术肇始的中心区域，大约自隋唐五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东移，这里有许多杰出的传统文化就地进入“西北化”和“乡土化”的生境中，特别是近代，在工商业经济发展、西风东渐的形势下，以新的社会文化科学观和田野作业方式记录、考察、整理、研究地方性及民俗性文化遗产，并将其视为资源而保护、发扬。从来以“古调独弹”自矜的老陕，在文化、社科、教育方面整体上缺乏自觉与自信，曾长期处于迟滞、狭隘、落伍的状态。明清以来，民间木版图画业在全国大普及，知名产地从地图上看星罗棋布。但是对这种文化资源价值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深度，国人不如洋人，西部不如东部，西部起步相当晚犹自踌躇徘徊，这种状况持续过相当长一段时期。譬如“十里洋场”的老上海，一个小图书馆里从清代后期到民国期间的木版图画度藏竟那么丰富，对此老陕们不能不自愧。新中国建立，社会（群众）文化机构得以健全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陕西才真正启动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规模性调查收集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仰赖第一代群众艺术干部的辛勤努力，从陕西省内凤翔、汉中、蒲城兴镇和长安郭杜采集到数量可观的各类民间木版图画标本，构筑了我们心目中陕西木版图画宝库的主体部分。前辈们做出了不可

替代的基础工作，为此我们深怀敬佩之心；同时也注意到，由于社会大环境诸种因素的限制，就文化考察工作的系统性、深入性而言，当年的缺课和欠账也是很明显的。经过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始的“阶级斗争教育”“四清”，再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间美术热”风靡全国，我们重新打点陕西省民间木版图画这笔资产时，才发现自己面临着很大的尴尬。当时非常令人难堪的是，除过凤翔县南肖里村在1978年重新恢复生产之外，凤翔县陈镇、陕南的汉中、长安郭杜以及蒲城兴镇竟然都找不到传统木版图画的踪迹了！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采集成了“绝响”，那些地区的木版图画发展竟然出现断层，这不能不让大家感到失落。

21世纪以来，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推动下，通过深入田野追踪调查和系统检索，我们重新认识历史资料，近三十年来被认为已经绝迹的几个传统产地的木版图画线索被重新发现和挖掘出来。由于得到抢救和保护，2011年“汉中民间木版图画”入列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兴镇传统木版图画”入列陕西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关传承有序的世家得到了正名和保护，许多旧版、老画样被抢救出来，这就为陕西传统木版图画较完整的历史面貌“拼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特别是为关中传统木版图画业曾有过的整体生态结构理出了脉络，这是陕西省新世纪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成绩。

二、曲折的追寻线路

在20世纪50年代蒲城兴镇便是老一代文化人心目中的木版图画业重镇，但对兴镇传统木版图画的再发现再了解，近四十年来却一直是人们心头的沉重阴影。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周克难、曹海水，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树村先生等都曾去当地考察访问，采集的样品和背景信息却不是很充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1979年到1984年间，在陕西民间美术复苏高潮迭起的背景下，陕西省群众艺术干部与外地专家多次赴兴镇寻访，希望找到它劫后余生的线索，但一次次的归来都只能摇头叹

息，说找不到了。1978年，我还在陕西省轻纺局工艺美术组供职时，曾参与凤翔县田家庄公社南肖里大队恢复木版图画生产的工作；1981年年底调入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美术组后，尽管分工并不在木版图画上，也曾借一次由合阳返西安途经兴镇的短暂间隙（大约是1984年），仅仅一二十分钟，在陌生的街道上匆匆跑着询问了几家店铺主人，得到的回答仍是：“早都没有了！”于是也灰心了，以为兴镇木版图画真的消失了。每想起对陕西木版图画遗产整理及历史研究造成的缺憾，常为之叹息。

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启动后，2009年春开始传来一些蒲城木版图画的消息，这当然使人振奋不已，多年以来已“死”了的心被再次牵动起来。但满怀喜悦与期待之心的我很快又坠入了困惑与紧张不安中，因为在兴镇木版图画传承保护对象认定的问题上意外地起了波澜。兴镇赵氏世家的有序传承戛然而止，报送的省级传承人变成了居住在他方的异姓人。依我在陕西工作四十年的经验，像这类乡村世家代代相传的技艺，凡发生异姓转移一般都是因为“绝户”，即没有后嗣的缘故，凤翔县陈村镇传统木版图画断根就有这个原因；若是异姓人继承那往往不是女婿就是外甥。深入追问后才明白，兴镇赵氏家族人丁兴旺，报送材料里出现的印版、工具、设备都是赵家的。那为什么不以赵家为传承对象呢？说是赵家的版子“卖”给这人了，那么买方何以变为“非遗传承人”了呢？两年后的2011年夏天，专家们再次途经蒲城，特意到兴镇寻访到了赵家人，向他们询问近两年来保护工作是否落实，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当真是一个与此项文化遗产素无关涉的“能人”竟成了“非遗传承人”，而一个有百余年传承历史的木版图画世家正面临财产被侵占、署名权被剥夺而无力自救的困境。兴镇传统木版图画这项文化遗产如果连这笔账都算不清，我们还能靠谁来真正地传承它呢？

三、从田野切入文化实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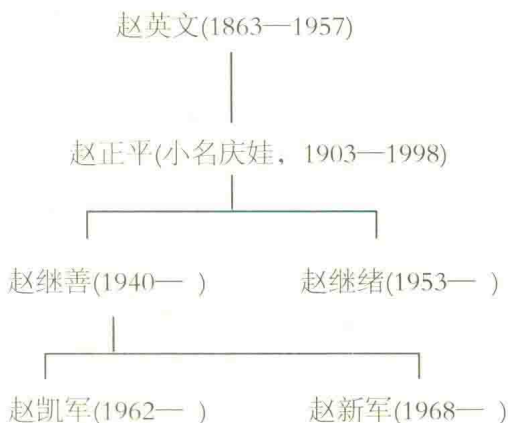
真实性还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原则？矛盾横亘在前。我们之所以如此“在乎”一个传承人的真假，之所以要跟那些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部门过

不去，不是为了牟取世俗的利益、权势和荣耀，而是为了捍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原则，这种真实性原则与社会正义信念、学术研究求真务实的规矩是契合如一的。提起“社会担当”，学者的力量其实极为有限，但学术的价值可能正在于它对真实性的坚守，可以发挥的正能量其实也仅在于它对事实真相的探求和澄清。既然兴镇赵氏一家被动地成了蒲城传统木版图画“非遗”保护的一个矛盾聚焦点，要了解兴镇传统木版图画业的真实历史也就无法绕开这个难点，前后拉扯了五年多的田野查访也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作业。对我们最为重要的慰藉是，借助这个矛盾聚焦点的激发，通过对赵氏一家及逐渐扩大范围的寻找和调查研究，我们长期抱憾和疑虑的蒲城兴镇木版图画的再发现和再了解难题，被我们抓住了一个真实而具体的切入点，进而对关中乃至整个陕西传统木版图画历史及深层结构的认识拓开了一条路径。

本书就是我们对以兴镇赵庆娃、赵继善家族为传承主体的蒲城传统木版图画业展开抢救性调查和多角度研究的一个集结汇报。需要交代的是，自2011年5月实地调查开始，起初出于个人关心的事件逐渐转变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的一项集体活动；参加考察的人员队伍逐渐扩大，研究上自然形成了分工，这个队伍属于业余群体，是一群“自带干粮来办公”的志愿者；还有一个特色是以西安美术学院的“亲情”为渊源纽带，成员包括教师、已毕业的校友和在读研究生。在这五年多时间里他们先后多批次前往蒲城、兴镇以及其他有关地点，对木版图画世家赵氏传人及相关人士进行了访问、追踪调查、座谈，鼓励并引导赵家积极翻寻旧存的雕版、画样遗存，及时取得这些新出遗存的信息，并进行勘验取证和整理、保护；与此同时产生了这部书的总体写作计划。

现呈献给读者的本书，写作体裁上包括口述史辑录、田野考察报告、工作笔记、专题讨论研究等多种论文形式。其中首篇专稿《一个百年世家的木版图画生涯——兴镇赵记老局传承人口述史采辑》，在集体访谈基础上由两位年轻的美术学硕士解境怡与赵明楠先后采访、录音并执笔整理完成；通过对多次反复采访的记录整理，基本理清了赵家的传承谱系。赵家高祖原居渭南，1874年左右（清代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举家迁徙到蒲城兴镇。迁居之前赵家在渭南至少已有两代人从事木版图画业，迁居蒲城兴镇后很快

发展成为当地专门的也是最大的“神局子”。赵继善家人现能追忆起名字的老辈人是约十岁时随父母来到兴镇的赵英文，自赵英文起家族内终身从事木版图画生产的成员如下表：



赵家木版图画业历经时代波折传承百年，其间戏剧般的起伏兴衰在这份口述史中得到了比较真实而全面的传递。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陕西省群艺馆在蒲城兴镇采集藏品的登记资料中记录到赵庆娃、温顺合、樊子顺、李振西四个尚生产木版图画的家户，1963年曹海水在兴镇接触过木版图画业户杨某并从杨家采集回一套雕版，这五家是那个时期所知的全部人事线索；而今整个兴镇从事生产并能够具体讲述自家木版图画产业史的只剩下了赵家。因此这份口述史辑录的文献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四、用实证说话

从调查中得知，兴镇赵家的木版图画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本上保持着连续生产，而且连“文化大革命”等最困难时期也没停止，只是转入了半地下、游击式的状态。这么说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多次的查访不遇竟是与赵家失之交臂！90年代里赵家一度生意兴旺，但我们的群众文化干部当时正被置于“以文养文”的窘境，没人顾及这件事，全省民间木版图画渐趋萧条。直至21世纪初那几年机制胶印的大工业产品牢牢占领了传统年画市场，赵家人才终于灰了心，他们积存的雕版再次被破柴烧火、被古董贩子套购；甚至在“非遗”保护工作启动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等，还被人巧言骗走一些雕版。所以当醒悟到自己陷入困境后，赵家人才开始在祖宅“老屋”翻箱倒柜，掘开地窖找出了当年为“避难”而藏匿的老东西，用以证明自家传承的历史。

由修建桥、张欣、王宇宇执笔的《赵氏世家存世雕版考察报告》，描述的内容正是总括了赵家生产现用的、从老宅新挖掘出来的、存放在县城里别人家的，以及由铜川市王益区文化馆从贩子手中回购收藏的一部分雕版。文化人常说“版本”，版本，版本，版才是木版图画的本。经这次统计，除过各种原因的损失之后，赵家雕制的木版图画印版现存于世的，调查中见到136块（这里我加上了2015年冬从荆姚镇原王村王应科老师傅处找回的两块壁纸版）；各项内容整合起来看，大致能构成赵家人自清末经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各时期木版图画印版雕作的实物链条。修建桥研究馆员积极捕捉线索并多次领队跟踪查访，表现了蓬勃高昂的工作热情与冷静沉着的专业素质，年轻的美术学硕士张欣副研究馆员在分析著录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们为这篇具有史证价值的田野报告付出了辛勤劳动。

陕西省艺术馆副研究馆员撒小虎负责的《赵氏老局旧藏画样考察鉴识笔记》，记述和析论的对象是赵家新近挖掘出来的画样旧藏，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直到21世纪各阶段的制品和试稿，总计76个画样。赵家新发掘的这些画样出于长期以来的累积，作者凭借敏锐的观察和耐心细致的分析，从图像学角度发现并整理出一些饶有趣味的时代变化

痕迹，在对实物做出详细注录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

以上这两大部分的写作，首先做到了现场感、第一手实证资料的完备和清楚，让事实和实物说话。这就是“田野”的力量，是科学考察、忠实记录、实事求是的力量。在这个田野的“气场”中，我们的文化史追索步步扎实，不仅有数据，而且有可触摸的质感；以往对兴镇木版图画的认识被大幅度突破，艺术学、文化历史学的思考也随之不断得到激发。

五、从蒲城兴镇到关中的民间文化生态

在总结田野新资料的同时，相关旧有资料的档案清理甄别与扩大地域范围的文献搜索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整体前进的强大推动力。这三个方面水平的提高，都是“新时期”才能提供给我们的新优势。进入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工作已二十年，负责保管馆藏民间美术品的第二代保管员张玲玲，克服困难积极主动，对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第一代老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采集收藏的木版图画旧样做了一次专题的全面清理，目的是彻底查清早期馆藏中出自兴镇其中包括赵家的木版图画作品；最后写成了《陕西省艺术馆藏兴镇木版图画清理甄鉴》。长期默默坚守“宝藏”的张玲玲，以新的认识与工作水平盘清赵家木版图画历史的家底，解决了一些“老大难”问题，全篇规范严谨的专业精神实为可嘉。有她对20世纪50年代老资料上多处“赵庆娃”名字记录的发现和汇录，才启发课题组将赵氏后人与他们的上辈如实对接了起来，赵家的传承史与陕西省艺术馆工作的传承史跨世纪重新接通，印证了那段为历史遗落、为世事掩盖了的文化传承链。

从陕西走出去的郃高娣本为陕西凤翔世兴画局后人，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深造，师从王海霞先生的研究生教育使她开阔了知识视野，获得奔走全国锻炼的宝贵机会。她将20世纪30年代初中法汉学研究所杜伯秋先生采集、今藏国家图书馆的陕西木版门画和著名学者卫聚贤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自西北采集的木版图画资讯转介回陕西，这些材料大大拉开了我们兴镇这个点上的考察成果比较的时空维度，舞

台面积一下子变得宽展多了。郇高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关中木版图画遗珍的探讨》一文中讲述，早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华法国学者和国内一些民俗学学者的关注目光就已经触及陕西包括蒲城兴镇在内的传统木版图画，所采集到的样本，有些在中法汉学研究所1942年于北平皇城根举办的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上向各界公开展出过，甚至编入刊行的展览图录中；著名学者卫聚贤先生大约稍晚几年从大西北各地收集的陕西木版图画产品样张，则被辗转带往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新中国成立初入藏西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西南博物院与重庆出版社据此编辑出版了有关画册。郇高娣以这些新见遗珍实例为基础，与陕西境内现存藏品进行实证的比较研究，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这种研究雄辩地说明：历史上任何一项民间文化遗产从来都是属于大社会，属于全人类的。每个地方“守土有责”，但若无视文化长河本身流动互通的活泼生态，无视文化学术的“社会公器”性，无视先贤乃至外籍先驱者的历史贡献，目光短浅、闭关自大的所谓遗产保护就难免误入歧途。

最后补加的《兴镇赵家演示的几样传统技艺》由陕西科技大学讲师韩湘执笔，对兴镇木版图画中几项富有乡土民俗气息的传统“绝活”的现场“写真”，其中包括了“炮皮纸”的雕版印刷与合装，“寒衣纸”“蜡笺版”的染色、拓印，壁纸包括顶棚花和炕围子花的印制，以及从“灯笼纸”到纸灯笼的制作过程等。相信这些图文互见的活态实录，定然会引起读者对民间智慧及乡土生活情趣的莫大兴趣。

深受这个团队力量的鼓舞，在对上述诸文认真审阅的基础上，我撰写了《由兴镇考察引出的关中木版图画业生态史回眸》一文，尝试对赵氏世家在兴镇，兴镇在关中，以及整个关中传统木版图画业中各个点的特殊作用和价值，做一个总体的评估、眺望。这次兴镇田野考察从各方面各角度所获取的新材料新信息，就已向我们透露出陕西近代乡俗木版图画一些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特色。当然，在缺少一个陕西全境的翔实真切的近代城乡经济史研究背景的今天，要达成一部以数据和事实说话而不是靠文学性想象说话的乡土文化史，仍是不可能的；不过为了接近这个目标，拿它与我从西安、长安的田野调查所得相联系，与我在凤翔与汉中的田野经验相联系，对于关中地带传统木版图画的活

泼生机、乡土生态，还有与时俱进的经济行为方式和流通渠道，多少能够看出一些脉络来了。

六、在田野追溯中感触文化史写作

田野永远是鲜活的。田野中的人民在创造生活，创造艺术，创造文化历史。我们必须谦虚地体察这种不息的生命力，认识它的生存规律，从而使我们的学习永不停歇。田野是人类文化的原生地，无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最基层的田野总是人类的根子，无论时势如何发展，我们永远不能鄙薄田野、疏离田野。要谨记脚踏实地、从自己亲身于田野所得的事实出发。最“古板”最老实巴交地实地考察，能不断地充实更新思路，使工作做“到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再地回想起毛泽东七十多年前在《农村调查》的《序》中“向社会做调查”的论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

……

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

这一真理是应当永远铭记的。

蒲城兴镇的传统木版图画历尽劫难依然存活在当地，没有放下身段就地调查的功夫

^①引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横排袖珍版第745—747页。

就得不到这种认识。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教育界先后对“详细询问、忠实记录”“素描”一类话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所谓“田野”的深入作业，与文艺“采风”式工作方法，存在着学术进步阶段性的差别。严格来说，兴镇“赵记老局”的木版图画生产在百余年间未断绝，并不是因我们的保护使然，说来惭愧，长期以来我们想保护它的愿望并没有够着它，没够着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当初的查访不够深入，同时也在于新老人员交替中存在缺失现象。尽管数十年间出自主流社会的环境压力不断干涉妨害，而它仍能坚持至今，是真正的民间文化自身生命力使然，也是中国田野环境的包容度使然；兴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艰难复杂生境中灵活应变、与乡土群众需求相亲融、顽强谋求生存的典型。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发挥自身“免疫力”而不成为温室里的花朵，蒲城兴镇这一典型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考察和研究带给我们这一方面的启发和深思，为新环境下民间艺术及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提供了新的实际经验。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一下本书的各位年轻作者。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研究上，以往发生过的间歇、缺位乃至大起大落的断层，期望今后不会再有了，而不断提高社会担当勇气与学术素养两种品质，满足社会现实对我们工作与学术研究的更高需求，却是不能止步的。希望你们身上，不要停歇你们的脚步，不要放下你们手中的笔。

2016年6月30日改定